

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人进逼平津，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人心惶惶，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

当时的院长易培基立刻召开了一个理事会议，通过了6万元的迁移费预算案，一开始考虑的是西安。但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分运西安的议案，改去上海。

接着易培基派他的女婿、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到上海去筹备，既而决定马衡第一批出马主持迁运。

可是真的迁移时，阻力就来了。曾做过湖南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的周养庵，一度做过古物陈列所所长，书画都雅致，并能鉴赏，突然站出来反对南迁，在太和门聚众演讲要用武力阻止。

受此影响，本来主持迁运工作，兴高采烈的马衡打了退堂鼓。他不仅在内部声明，居然还公开登报，说他是不能去了，搞得故宫博物院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易培基请故宫博物院常务委员、古物审定专门委员吴瀛代替马衡任总押运官，吴瀛顿感压力山大，这么多无价之宝，时值乱世，倘若出了差错，成了“青面兽杨志”，该当何罪？一时踟蹰，但经不住易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就勉强答应了。

南迁之前，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周养庵这些反对的声音。易院长想了一计，打了一个电报给行政院说明了周养

庵率众阻挠的情形，请示北平当局制止，同时，密定了迁运的路线是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日本人袭击。

一天，周养庵演讲后刚到家，两个警察就找上门来。

警察问：“你们这里住着一位周先生吗？”

他答：“是我！”

警察不由分说，一下两个嘴巴，拖住他就走，捉将官去，给了他这么大一个下马威，周养庵再无声言。

第一批南迁文物出发了。一共是21节车厢。一节车是吴瀛和几位监视人员、押运的职员乘坐，还有大约一二节二三等车安置了宪兵队长、警卫官长、其余的职员侍从，以及100名东北宪兵、本院警察等等，其余车辆都是装着古物的铁皮车。

路经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风声甚厉，听说有劫车的企图，他们都认为中国2000多年历史留存下来的这些瑰宝，平素在皇宫轻易都看不到，这回出宫绝对是打家劫舍的好机会。一天晚上，已有1000余人在徐州附近向车行地段窥伺，只是被地方军队发觉打了一仗，匪众知道泄露劫宝行为了而且官方有备，所以才退去。

第4天，他们到达南京下关，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到了，才知道，又发生变故。原来国民党内部认为，古物迁上海托庇租界，是国耻，所以要改迁他处。具体去哪，还要商量。

这样停顿了两星期，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的地点，比如洛阳、

1949年8月23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图书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

1951年

故宫博物院业务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院以下设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古建筑管理等部及图书馆。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后划归中央档案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52年6月26日

故宫博物院开始清运院内各处积存渣土、垃圾。

1952年

接收毛泽东主席捐献《钱东壁临兰亭序十三跋》手卷一件。马衡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4年夏

吴仲超接替马衡任院长。

1954年11月27日

“故宫博物院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成立。

1958年9月12日

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南迁文物4027箱运回北京。

1965年

故宫博物院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二月15日正式开幕。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博物院也未能完全幸免，提出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统统或改装、或拆掉的“整改方案”。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博物院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1967年5月26日

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

1969年9月22日

故宫博物院职工开始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1年7月5日

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